

Fin de Siècle Social Theory

世纪末社会理论

[美]杰夫瑞·C.亚历山大 著

张旅平 等译

社
会
理
论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Fin de Siècle **Social Theory**

世纪末社会理论

[美]杰夫瑞·C.亚历山大 著

丛书主编 苏国勋
杜小真

社

张旅平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社会理论:相对主义、化约与理性问题/(美)亚历山大著;
张旅平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理论译丛/苏国勋,杜小真主编)

ISBN 7-208-03924-0

I. 世... II. ①亚...②张...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9706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特约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社会理论译丛·

世纪末社会理论

——相对主义、化约与理性问题

[美]杰夫瑞·C. 亚历山大 著

张旅平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5 字数 235,000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924-0/C·117

定价 18.50元

丛 书 前 言

“社会理论译丛”是一套旨在向读者译介国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进展的系列丛书。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重要著述的选译,能丰厚我们的理论积累,从纵深上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增强我们的社会想象力和理论反思能力,以利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

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质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故,当代许多社会思想家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A. 吉登斯等人,从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是冠名为“社会理论”,其意在于强调,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脱离开对构成人类行为之背景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赖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也是它的条件和限制,二者同样不可须臾或缺。而在我们现行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由于历史和现时诸种因素的制约,无论社会哲学抑或社会学理论都是相对发展缓慢,迄今仍属薄弱的环节。这与处在转型中的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大幅加快、社会结构急速变迁的形势很不谐调。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社会理论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变化,才能适应 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环境,解决由此带来的种种冲击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哲学研究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狭窄的概念框架内,这里且不论这种沿袭斯大林式的做法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一分为三——作为它的自然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外推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亦即辩证逻辑——在学理上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仅从实践后果上,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孤零零的几条原理,成为学生们死记硬背用于应试时的干巴巴教条的做法,就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完全相背离,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再来看看社会学。众所周知,社会学自 70 年代末从中国大地上破土复出后,迄今已走过 20 年的历程。当我们回首这一过程时,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学在学科知识普及、专门人才的培养、分支学科的涌现、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 50 年代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会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令人忧心的危机。事实上,社会学从获准恢复研究之日起,就带有它定位上的某种残缺。例如“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剩余科学”等观点,尽管出于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的曲折经历而在复出伊始刻意凸显其经验研究性格,意欲摆脱哲学干预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得到根本的弥补。结果就造成应用研究大多未脱离社会调查统计的层次,理论研究却亦步亦趋地甘当这种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究其根本,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上抱残守阙。社会学如果缺乏了社会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必然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不仅就像一个

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分工体系中立定自己的脚跟,而且势必会失却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卢曼直至布迪厄和福柯等一代代社会思想大师们所烹调出来的社会学味道。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也由于实地调查报告式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的升级困境,忽视社会理论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竞相像谈论时髦明星那样把社会理论大师挂在嘴边,或者置于文章注释中作为点缀,那也不过是学术泡沫现象的泛起,恰恰从另一侧面表现出社会想象力的枯竭,与真正的学术建设和品质提升了无干系。

要克服社会学表面繁荣和背后危机四伏的症状,不仅需要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大功夫,而且要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扎扎实实的基础建设工作,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能为这一建基性工作增添些许砖瓦,作出绵薄的贡献。

苏国勋

鸣 谢

本书各篇文章以近年来纷繁驳杂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社会理论中正在发生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型。如果说我本人有幸曾参与社会理论的某些发展的话,那部分地要归因于我曾参加我与我的亲密的波兰同行 Piotr Sztompka 于 80 年代后期共同组织的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置身于这个具有融洽氛围、极富启发性而又充满辩论的群体之中并结识这些超越民族界限的知识界人士,为本书第一、二两章的写作提供了初始动机。(第一章发表在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994 年夏季号], 第二章发表在亚历山大和 Sztompka 共同主编的《反思进步: 20 世纪末的各种运动、力量和理念》Boston: Unwin Hyman, 1990, pp. 15—38。)第三章的写作是由一场极富挑战性的讨论会引起的,这场讨论会是由我的朋友席德曼(Steven Seidman)组织的——或者应该说是由他挑起的?(第三章发表在席德曼和瓦格纳[David Wagner]共同主编的《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社会理论》New York: Blackwell, 1992, pp. 322—68。)

1992 年春,在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逗留期间,使我有机会摆脱美国学术生活中的行政事务和教学的重担而获得一段自由时间。在此期间,我完成了本书的第四章(缩写形式以 *La Réduction: Critique de Boudieu*, Paris: CERF, 1995. 的题目

出版),并修订了第一章。我为能与维托克(Bjorn Wittock)这位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与乔厄斯(Hans Joas)并再次与 Piotr Sztompka 两位同事的合作深感欣慰。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下述各部分的内容,并先后受到过各种不同的评论,这对于形成今天这个形式的各篇文章受益匪浅。我希望在这里表明我对参加过各种例行的、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集体交流形式的诸位同仁的诚挚谢意。

除了 Piotr Sztompka 和席德曼之外,我还对与其他几位同仁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交谈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是:瑞典的 Ron Eyerman,英国的 Ken Thompson,南加州的 J. Nicholas Entrikin, Roger Friedland 和 Ivan Szelenyi。

近年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非常富于启发性的研究生使我受到激励和鼓舞,我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与他们每月都参加一个名为“文化俱乐部”的聚会。我应该特别提出的是 Philip Smith、Steven Sherwood、Anne Kene 和 Eric Rambo 对本书内容作出的贡献。

在撰写本书各篇文章——特别是第一、四章两篇文章期间,我有幸在巴黎度过了我的一年假期,在此期间我曾成功地造访过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e des Etudes Politiques[Science Po])、社会科学高等学校(Ecole des Hautes en Sciences Sociales)和波尔多大学。这些机遇既为我带来了思想激励,同时也为我提供了反思空间,为此我要感谢 Alain Touriane 和他在 CADIS 的同事们,特别是 François Dubet 和 Michel Wieviorka。同样,我也不能不提到 Daniel Dayan 的巴黎同事们 Laurent Thevenot、Luc Boltanski、Frederic Vandenberghe、Erhard Friedberg、Didier Lapyronnie、François Chael、Raymond Boudon 和 Philip Besnard 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曾就本书的各个论题与我进行过研讨。

上述各位为形成本书各篇文章的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发自内心地诚恳地说,上述任何一位同仁在下边即将展开的个别论证中的功劳我都不敢专美。我还要感谢 Simor Prosser,是他为本书构思出了这一书名。

杰夫瑞·C.亚历山大

1994 年 7 月于 Rnedu Valde Grace

导 言

本书所选各篇论文的内容是由一种两难推理引起的。在本世纪(指 20 世纪。下同。——译者)期间,理性的显赫地位在式微,与此同时,对于有把握成为合乎理性判断的信心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那种认为理性只是由于科学、资本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发展才成为西方社会和社会思想的核心想法,是大错而特错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传统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理性组织起来的,使世界组织成了有序性的力量,用抽象要求约束整个人类,因而基于尘世的我们的情感和主观性,与这种普遍的合乎理性的客观要求之间存有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从而产生了持续的张力。这是一种客观化和普遍化的宗教的超验动力杠杆,它激发了对入世实践至善论的要求,并为世界其他文明在向“现代性”的批判性转变中实现前所未有的变革提供了可能。

在 16 和 17 世纪,伴随着现代科学和世俗社会思想的产生,“理性”隔断了与出自神意的合理事物的联系,并最终完全不同的途径被理解为是出自于尘世的发展。它仍然保留了直线式的、历史的、受非人的和客观的力量支配的强有力概念的地位,但已不再拥有能满足一切和保障一切、作为一种预先设定的超验精神支柱的终极目的之意涵。

拯救之梦已完全被理性之梦所取代。社会思想家开始相信人类天赋具有一种穿透力和逻辑性思维能力。他们相信,表现这些能力的各种制度安排将会得到发展,因此无限进步和永久和平将会是最终的结局。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普通人和受过训练的人都同样坚信自己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尤其 17、18 世纪的经验主义思想家和理性主义思想家们更是如此,即使是浪漫主义者也是充满高度激情的。这种高度自信的心态是与社会的发展、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最初状况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惊人力量相匹配的。从霍布斯、卢梭到圣西门、孔德和斯宾塞,这些早期社会思想家的作品中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氛围。在心理学、艺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思想家们对明显具有理性主义形式的各种视角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奠基于 20 世纪的这种理性之梦,是以对理性非凡成就的巨大期待而揭开序幕的。理性步入没落是在社会和社会思想领域。失败的不仅是基于应用理性和据称是合理交换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和不稳定。西方文化的伦理合理性也屈服于狂热而又虚弱的种族主义和仇恨外国人的情绪。世俗文化本身也出现了异化和无聊的可怕顽疾。

人显然不可能是合乎理性的,或起码是不可能像“现代性”初始阶段提出的那样,在狭义和最终意义上是永恒合乎理性的。这种理解无视行动、思想以及社会秩序本身的非意识起源;它无法说明强烈情感以及关于爱和恨之类的幻想的作用。质言之,理性主义视角无视人类具有使他们的世界成为有意义的、符号表达成首尾一贯的、形式化的,以及被组织成“仿佛如”经验世界所提供的终极目的、乃至世俗方式所把握的善那样一种永恒的欲求。

生活中的这样一些需求、这样一些维度曾被早期理性主义

思想所否定。结果,对于 20 世纪的许多富有创造性和敏锐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言,理性已成为一种熟练老到的自我缺场和自我异化。世界似乎不再是为人而设的,而是被理论化为非人的和压抑性的。所谓的“社会力”(Social forces)造成非人道化和被动性并且悖离责任。许多思想家和行动者转而相信,只有施虐狂式的自发行动、情绪冲动的暴力行为才能对“机器”造成破坏,才能为人道开辟新的形式更可靠的空间,使理性再次被人们所确认。暴力与(退化的)理性——导致对象化和宰制的理性——之间的这种命中注定的两分法,就这样第一次被牢固地确定下来。

当理性之梦变成了理性之梦魇时,引起了三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宣告现代性的实验失败了。理性的普遍主义是一种抱负,从未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由于制造出了欺骗性的广大空间和范围,普遍主义实际上应该对理性所制造的大规模灾难承担责任。相对主义和地方主义只是能贯穿一个善美社会的标准。现代性导致大屠杀,后现代性导致宽容。客观性导致对象化。惟有反原教旨主义才能创造出使一切都不受强制而返朴归真的氛围。

这种对理性危机的第一种反应,并非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近年来在后共产主义、后自由主义和后空想主义世界中得到复兴的、许多人构想他们生活在今天而持有的特殊法宝。第二种反应现时已较少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制性,但仍保留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最强的和最具野心的分析纲领的内核之中。这种反应不是相对主义的,但却是化约(reduction)的。理性不是像在相对主义那里一样被拒斥的,而是被化约成一种文化模式或实质目的,或者说被化约成一种方法。这种脱离具体脉络的社会科学方法会使我们看到,理性和普遍的道德性并非像它本身

那样存在着,而仅仅是以特殊形式对社会结构的反映。平等是对官僚制等级的一种反映以及对社会控制有效形式的需求;民主是在斗争中新近获取权力的阶级的一种产物;宽容是由全球化和由竞争的市场以及相互交织的社会生活网络造成的流动和个体性所引起的。实际上,这些都只能是对理性的宣称,起到积累力量的策略和手段的作用。理性之梦本身只是诉求宰制的一种策略。理性危机并不是社会的普遍问题,而只是一种特定方案的失败。现在已经有了其他一些方案,对于这些方案来说,另外一些意识形态是有用的。祭起普遍性的标准这个法宝是无济于事的。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阐明,对理性危机的这些反应是不可靠的。首先,这两种反应在思想上首尾不一贯。相对主义表现了一种认识论悖谬,从推论在任何普遍性领域中主体性在场到推论任何普遍性领域中主体性缺场,即是证明。化约主义表现了社会学悖谬,从观念的社会起源到观念除其社会起源之外别无任何其他起源,即是证明。其次,这两种思想在社会意义上或道德意义上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只有当行动者和集体能够共同分享某种较大范围的感觉能力时,复杂社会才能够成为有组织的和整合的。这种情感可能是反集体的;它可能是地方性的和具体性的;它可能被承认是当然的,但却不能以任何明确的方式归纳出主题。然而,某些情感必须广泛地被分享并且要对一切关切负有义务。自由、宽容、参与,还有多元文化主义,都依赖于全社会地分享那些具有超越的目标和普遍的范围的思想。确实,只有当我们看到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像我们本身一样,并比我们本身更大的某种东西的成员时,当其能把我们缔造成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人性的组成部分时,我们才能承认他者的确实性——我们才能正面地以具体而现实的方式认可我们的同伴的

社会成员地位。作为相对主义的一个部分,化约主义曲解了这种联系的思想可能性,其做法与相对主义如出一辙。它把因果性的可分析性概念变成了对主观承诺的整合性和观念的道德性的攻击。如果行动者和集体把它们的道德标准仅仅当作某种“基础的社会结构实在”的心灵主义的再现——这正是化约主义所热心坚持的主张,那么现代社会会是什么呢?

对理性危机的第三种反应是,在不指明普遍化意图的情况下把相对主义和社会建构合并。在这种看法中,理性不是一种内在能力,也不因为仅仅被理解为计算工具而必然是贫乏的。理性是一种复杂的而又和谐统一的文化建构,它只有在一个不断分化的、强有力的制度基础上才能成为持续不断的。理性的、客观的、宽容的、包容一切的,也就是符号编码和宏大叙事,它们根植于传统之中,而非内在能力之中。虽有它们的建构性质,它们却能够唤起一种洞察他者动机的能力,并且能够引发责任感和互相尊重感。理性对相对主义是一种虚假和危险的二分法。然而可供替代的方案必然是以某种别的、而不是以一种粗陋的化约方法看待理性,因而在“社会的”意义上使理性变成相对的了。理性对特定动机、行动和社会结构能够发挥强制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对它们而言又完全不是相对的。

19世纪中叶,在削弱相对主义和化约主义的影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世纪末,即第一个世纪末(fin de siècle)时期,理性的真正危机发生了。各种新的和坚持己见的倾向都在社会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它们对右派和对左派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这一过程贯穿了20世纪。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人如弗洛伊德、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等思想家,都参与了这种对合理性的反思,但都不涉及从道德上或经验上废止理性的涵义。他们重新发现了非理性,但并没赋予它以崇高地位。他们殚精竭虑

地诠释非理性,而且同时还要思考如何才能使之发生转换,以及作为归宿的现代性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位置。

20世纪即将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纪末时期。至少对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近年来的许多历史事件看来是与理性进步的终极目的相悖离的。相对主义和化约主义一度再次威胁要取代更多是以理性为中心的思想形式的地位。世纪之交的社会理论奠基者们的思想能够指引我们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反应,但这些思想必须是深刻的,更牢固地建基于后实证主义之上,并能超越由于思考与“现代性”有关的当代历史而产生的道德的和经验的困境。当代社会理论的创造者们——这里指的不仅是第一代,而且包括如列维-斯特劳斯、帕森斯和凯恩斯(Keynes)等人在内的第二代——仍然受到一种观念的极大钳制,即认为西方社会通行整个世界,这种支配性地位只是在现今才开始遭到破坏。这些束缚甚至在这些思想家的精深思想中表现为一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强烈反差,一种线性的历史断裂观念,这些都使人联想到现时代,或许使人认为这可能就是历史终结点的标示,从此之后一切基本的变化可能都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与我们今天所描述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威胁着理性和普遍主义的力量和观念同样也使以基本的方式反思它们成为可能。普遍性的断言必须让位给普遍主义的方案。合理性必须被设想成更接近于一种话语(as a discourse)而不是一种经验事实。现代性作为一个发展范畴必须被加以拒斥,虽然它能被理解为一种最重大之事的语意符号。我们不可能是后现代的,因为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从未是现代的。我们不可能是相对主义者,因为我们现在理解了从未有过任何超历史的绝对。我们不可能是化约主义者,因为我们现在理解了理性的自主性和普遍主义正是美善社会本身的产物。

目 录

丛书前言	苏国勋 1
------------	-------

鸣谢	1
----------	---

导言	1
----------	---

第一章 现代一、反一、后一和新一:知识分子如何

编码、叙事和解释“当代的新世界”	1
------------------------	---

一种新的“转型”	2
----------------	---

现代化:符码、叙述和解释	6
--------------------	---

反现代化理论:英雄的复活	17
--------------------	----

后现代化理论:失败、屈从和带有喜剧色彩的超然

态度	23
----------	----

新现代主义:戏剧性的膨胀和普遍的范畴	30
--------------------------	----

新现代主义和社会邪恶:作为被褻渎的表象的民族

主义	37
----------	----

现代化复归了吗?线性的傲慢和理论健忘的危险	46
-----------------------------	----

第二章 在进步与灾变之间:20 世纪的

社会理论与理性之梦	84
-----------------	----

理性的直线:进步	86
----------------	----

理性之美梦	89
一道斜坡:乔治·索列尔的预言	91
退步的直线:非理性	94
理性之噩梦	99
跨越两个世界的社会理论	102
结语	108
 第三章 后实证主义模式中的一般理论:	
“认识论两难”与对现实理性的追寻	117
文化史中一般和具体的辩证法	119
社会思想中的一般和具体	123
战后时期的科学主义和理论主义	125
情境论作为新浪漫主义的转变	127
对理论和“真理”的深度怀疑主义	129
反理论相对主义的典范:理查·罗蒂的 哲学及其后现代重述	135
理论的后实证主义状况	144
 第四章 还原的实在:皮埃尔·布迪厄失败的综合	
针对文化理论的使人误入歧途的批判	173
客观力量的主观化:习惯	180
从习惯到策略	201
“无意识策略”的矛盾修饰法	205
“场理论”和同源相似:对制度性自主性的还原	213
研究纲领和经验性还原:经验研究的“双重决定论”	223
作为场的教育和科学:不断生产的习惯和不断再生产的 分层	227